



# 二二八事件中的學生運動

王峙萍\*

---

\* 王峙萍 文史工作者



## 前言

長久以來，對於二二八事件的解釋與看法，一直存在著官方與民間的分歧，而此次事件的動機與發生過程，在國府的壓抑下則一直無法呈現出原貌，台灣人的反抗運動也常被曲解為「暴動」。在當時的台灣校園中，身為知識份子的教師與學生，在面對台灣之困境所表現出的積極與熱誠，造就其抗爭的動力，這一份動人的反抗情懷，對於台灣民主史上的發展，具有推波助瀾之作用。因是如何闡述二二八事件中的校園與學生反抗運動，重新對此抗爭事件定義，使其不再被指稱為「暴」或「亂」的代言者，到底是「暴動」亦或「抗爭」，兩造的說法一直以來為台灣歷史上的混屯，形成一種曖昧，官方的刻意營造使得「事實」遭受到曲解。

在過去許多的二二八事件研究中，有相當多分歧的看法及論述，最主要原因則是因國民黨政權長期刻意的積壓史料，不願正視這個問題，聲稱要避免引起省籍衝突，或說要遺忘過往的傷痛，而不願意公佈史料檔案，用以壓抑二二八事件的研究。個人認為研究者依據史料從事研究，但限於能參考的一手資料有限，且官方史料又不盡客觀的情況下，難免產生分歧的說法。今日，政府開放二二八史料，雖是當時的官方檔案紀錄，但是仔細檢視，不難從中理出更多前所未聞的疑點，也使得二二八研究之脈絡更為清晰，相信這是從事歷史研究者相當樂意見到的景況。

從許多的口述歷史及史料中得知，當時台灣人的反抗行為並非如國府所言的「暴動」或「要求獨立」等認知，實是對現實政治下各式措施的不滿，因而引發台灣人大規模的抗爭事件。由2月27日台北的緝煙事件開始，官方不負責任的蠻橫態度、及使用武力射殺民眾等情事，使得人民的情緒愈發沸騰。此導火線從台北蔓延至全台，各地的人民為求自保開始進行組織活動，部分地區甚至出現與國府軍隊對抗的武裝隊伍。各縣市紛紛成立二二八事件



處理委員會，並以處理委員會為中心，企求將心中的不滿與期待告知政府，希冀獲得政府的肯定與改革。但陳儀與官方的敷衍與偽善，使得台灣人被冠上了「暴動」的字眼；原本單純地為前途抗爭的行動，成為叛國的指標。國府不顧一切，並未經調查即派兵來台鎮壓，來台的軍隊接受命令在台灣各地大開殺戒，血洗台灣島。

而在二二八事件發生後，校園中的反應與師生的行動，其凝聚的反抗意識及行為，在整個事件當中具有重要的地位。在分析事件中的校園及師生的動機與行動中，可以理解學生們的反抗運動實為追尋理想的抗爭，而非國府陳述的「暴動」行為。蓋因雙方利益著眼不同而產生了立場的差異，也導致事件中的許多主角含冤不明，無法洗雪背負的罪名。這類的曲解造成台灣社會隱藏的陰影，如同不見天日的生活，省籍情結也一直引發人民衝突。國府的鎮壓與綏靖，及其日後的白色恐怖，對台灣人所造成的傷害實是無法計算。

本論文欲以事件前後的台灣校園作為背景，以教師及學生為主角，究其在面對新統治政權，所遭遇的問題及其反抗意識作一說明，並探究在二二八事件發生後，各項經由學生被動或主導的行為活動，以及這些學生運動所展現出的意義，與其所造成之深遠的影響。

## 青年知識份子的孕育

### —日治時期與戰後至二二八事件前的台灣學生

#### （一）日治時期的軍事教育的影響

日本統治台灣五十一年，近代學校教育的施行使得台灣青年得以接受新式教育的洗禮，無論在學科智識或體能的訓練上，都與先前有全然不同的轉變與突破。在學校教育的訓練中，1926年（大正15年）年開始施行的「教練



課」，是針對中等以上學校學生的體能與軍事訓練，其意約等同於今日的「軍訓課」。課程中主要介紹軍事佈局及武器操作，並有實地的軍事演練及打靶的操習。針對日治時期的學生軍訓教育做一了解，目的是在於分析之後的二二八事件中，學生在反抗過程中對於武器的使用，以及利用武器抗爭，及在事件中較熟於戰況模擬的部分。

太平洋戰爭爆發後，原本不要台灣人當兵的治台政策有了轉變。1944年日本因戰況緊張，於9月1日在台實施徵兵制。到了1945年年初，全台在役齡內的青年全都徵召。由1943年起，總督府也強行抽調學生入伍，使得在校的青年學生，也必須參加「學徒兵」。

1937年中日戰爭爆發後，日本開始在殖民地補充兵員，1942年起在台灣實施「陸軍特別志願兵令」，徵召自願入伍的台灣人，年齡限制在十七歲至三十歲間。1943年又實施「海軍特別志願兵令」，凡台灣籍男子年在十六歲至二十歲間都可參加，1944年又改為十四歲至二十歲。在未實施徵兵令前，在全島就有「挺身報國隊」、「義勇報國隊」、「皇民練成所」等組織，對台灣人加強軍事訓練，同時也對一般民眾宣導戰爭情形。1944年公佈「台灣青年特別練成令」，在全台設立27個「青年特別練成所」以訓練台灣青年，每年分三次各招收500名人員，受訓期為四個月，共計一年有40,500名青年接受訓練。<sup>1</sup>1944年正式在台實施全面徵兵令，且於1945年年初對全島適齡青壯年施行身體檢查。至1945年8月15日日本戰敗為止，台灣人被徵為日本兵者計有80,000多人，而被徵為軍屬（陸海軍的文官、雇員）、軍伕者達126,700多人。<sup>2</sup>1945年開始，盟軍大批出動轟炸台灣各地，3月3日起，全台灣中等學校學

1 台灣省文獻會，《台灣省通志稿政事志防戍篇》，頁238~239。

2 見李筱峰，《台灣史一百件大事（上）：戰前篇》，台北：玉山社，1999，頁177。



生被動員組成防衛警備隊，準備對抗美軍登陸。

檢閱日治時期的學生軍事教育，可發現日本的軍國式主義在殖民地仍舊無孔不入，對校園中軍事教育的逐步重視與策劃，亦反映出當時日本的統治精神與其目的。而具備中等以上教育程度的台灣人，相對之下也具有基礎的軍事能力，從武器的使用至部隊的行進攻堅，文武皆備。這在日後二二八事件中的反抗運動，是一股不能忽視的影響力。了解日治時期的學生教育之後，可以出現如下的結論：一、中等以上的在學生，因為「教練課」的訓練，學生得以對基本的軍事有所認識，並且能夠操作簡單的武器；二、在戰時，日本為對抗敵國，在殖民地成立許多教育軍事的養成所，並且動員學生參加軍事組織。另外，由於全面徵兵的命令使得許多在學學生被送到了戰場上，因實際經歷戰爭而對武器的利用有更進一層的熟悉，且在軍事上的策劃與攻擊行動中，部分學生能夠有步驟的作一統劃。在之後二二八事件中，學生起而反抗政府，並且能夠擅用奪取來的武器，對抗國府軍隊，這個前因不可忽略。

## （二）戰後初期台灣教育所形成的反差

二次世界大戰原本混沌不明的戰局，在 1941 年日本恐怖襲擊珍珠港之後出現了極大的轉變。原本採取觀望態度的美國決定不再姑息而加入戰局，之後更在 1945 年分別投下了兩顆原子彈於日本的廣島及長崎，造成日本莫大的損傷。同年 8 月 15 日，日本天皇向聯合國盟軍宣佈投降，聯軍最高統帥再指派中國戰區最高統帥蔣介石，代表接受日本在中國戰區的投降，被日本統治的殖民地台灣也因此暫時被拖管於中國，國府稱之為「台灣光復」。

國府的對台接收，造成台灣的教育界產生莫大變化。教育相關單位從主事者到教育人員全都大洗牌，因國府人員素質的參差不齊而造成對台的教育事務眾多誤解，並衍生而出許多的問題，許多來台擔任教育界主管的外省籍



人士，更將貪污包庇等問題帶入了一向標榜清流的學界。此外，原有學制與教育內容的變更，則對於學生有著更直接的影響。

在修業年限的更動方面，大學由三年延為四年，預科由二年減為一年，原日治時代專科學校本科與專修科合改為專修科，學校修業年限則由三年延長為四年。可詳見表1。

表1 日治時期與戰後初期學制比較表

學校種類		大學	大學先修班(預科)	專科學校本科	專修科
日治學制	修業年限	三年	二年	三年	一年
	入學資格	高級中學畢業 預科畢業 專門學校畢業	舊制中學畢業	舊制中學畢業	舊制中學畢業
戰後學制	修業年限	四年	一年	四年制專修科	無
	入學資格	高中畢業 舊制中學畢業繼續在較高級學校肄業滿一年(五年)或二年(四年)或曾補習一年或二年者	舊制五年中學畢業 舊制四年中學畢業曾補習一年者	舊制五年中學畢業者 有前項同等之學力者	

(見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編《台灣省五十一年來統計提要》，1946、黃玉齋，《台灣年鑑4》，台北：海峽學術，2001.3。)

在教育內容方面，可以清楚發現在日本統治時代結束後，原本的「皇民化」轉而以「中國化」替之，成為一種「再現」的形式，重新降臨台灣人身上。對於國民黨政權而言，它是這塊土地的新主人，台灣人反是以「他者」的形象出現；亦即，非中國文化以外的都屬於「他者」。因此，如何肅清前統治者所留下的污痕，使自身能更有效並輕易的統治新領土，成為迫切的課題與目標。對於教育內容的改革大致上可由兩方面來談：



## 1. 清除日本餘毒

以民族的心態言，從「接收」台灣的國府在當時所發表的各種言論（包括書面或訓辭、廣播等），可知中國人對於在日本殖民下而回到「祖國」懷抱的台灣人，似乎存抱著征服者的心態。1945年3月的「台灣接管計劃綱要」通則的第四條說明：

「接管後之文化措施，應增強民族意識，廓清奴化思想，普及教育機會，提高文化水準。」<sup>3</sup>

再者，就文化的角度言，在日本的教育及社會風氣下，使得台灣人處處顯得客氣而有禮：他們排隊購物、買東西不討價也不還價、舉止斯文、路不遺拾夜不閉戶、見到人必脫帽欠身招呼等等。以殖民經驗言也意謂著身為前日本殖民地的台灣，的確與日本共享著一種獨特的文化關係。這樣的情景使得來台的多數中國人相當不慣，因為他們的生活態度並非如此。他們之中的許多人並不懂得排隊，買東西愛貪小便宜，甚至不誠實，同時隨地吐談，順手牽羊，到別人家中不脫鞋便直接踏上榻榻米或地板，在辦公室把雙腳抬到桌上就看起報紙來…。這樣的粗魯行為看在台灣人的眼中真是詫異。他們已經是相當有文化的國民，但面對這樣的中國同胞們，只能是由驚訝而逐漸產生了輕視；而對中國人來說，台灣人的斯文有禮則是「奴化」的象徵，只有抱著如此的心態，才能掩飾他們的粗俗。因此，改變這種「奴化」的思想，便成為教育的一個重點。

## 2. 國語活動

為了迅速清除「日本餘毒」，最顯著的便是「國語運動」無所不在的推

---

3 張瑞成編輯，〈光復台灣之籌畫與受降接收〉《中國現代史史料叢編》第四集，台北：國民黨黨史會，1990.6。



行。其普遍程度甚至在全台灣的鐵路、公路站名表、民營公司公路站名表及臺北市街巷名稱，都以注音符號在旁標註，鐵路站名更換加有注音符號的名牌。在1946、1947年間，臺北市及花蓮市的街路名牌，都是以注音符號國字譯符三行所寫。<sup>4</sup>目的是使台灣人能夠在「國語環境」下學習中國字，以達到「同化」的目的。

而不論是實行「國語運動」或是編寫教科書等，都是一種新的「殖民化式」的行爲，重新在此建立一套具備可以熟悉原先「祖國」的文化工具，得以對不解其文化的人民以威權展現統治。就其內容言，事實上不過是佔少數的上層階級所創造出的神話，而這一類被曲解過的神話，在國府強而有力的積極推動與執行下，卻成爲形塑台灣人的新國家認同觀與集體意識。

因著兩造不同文化背景與政治統治的政策與心態，也促使台灣戰後初期的教育制度與環境有了相當大的轉變，尤其是在負面的部分更是加深台人的不滿情緒，或許是在討論學生涉入二二八事件時不可忽略的因素之一。

## 二二八事件中的學生活動

### （一）學生組織與行動的方式與目的

1947年的2月27日下午七時半，台灣省專賣局查緝股職員葉德根、盛鐵夫、鍾延洲、趙子健、劉超群、傅學通等六名與稽查大隊警員四人，乘一輛大卡車在台北市內查緝私煙。因有線人告密，在台北市的天馬茶坊前，查獲到躲避不及的婦人林江邁販賣私煙，強行將林氏的私煙沒收，甚至還搶去了

---

4 國史館，《中華民國史文化志》。



她販賣私煙的錢。林氏當然不依，賴以養家活口的錢如何能失去，因此下跪求查緝員，沒想到查緝員搶了錢之後還變本加厲以槍托敲打林氏頭部，當場血流如注。一旁早已有許多圍觀民眾對於查緝員的舉動十分不滿，再見到查緝員竟然公然傷人，因而包圍查緝員且企圖阻止，查緝員見情勢不妙，分別逃逸。其中一位查緝員在奔逃途中開槍示威，卻不幸誤傷一位在二樓陽台張望的男子陳文溪，當場倒地，事後不治。追趕的眾人更加憤怒，群起到專賣局要求交出禍首，卻無法獲得結果，進而進入局內搬出桌椅等放火燃燒，此為二二八事件之始。

至2月28日，發生於昨晚的事件已多方傳遍各地，大家都深感憤恨不平。「那些可惡的外省人竟然敢如此的欺壓著我們，絕對不能再姑息了！」民眾們紛紛議論著。長官公署的傲慢態度，以及向聚集於長官公署前抗議的民眾進行射擊，這些都使得憤怒的台灣人燃起一把又一把的怒火，事件也隨之擴展開來。

3月2日，「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成立，並由與會者擬出組織大綱。在組織大綱中提到，其委員除了包括各級民意代表、人民團體之外，亦有「中等學校以上各校職員、學生各選出一名，但大學各學院係一單位，職員、學生各選出二名」<sup>5</sup>的條列。由上述條文中，可以了解到學校的教職員及學生，在委員中佔了一定的人數。除了學校成員在社會上的地位及影響力之外，這亦顯現出當時學校成員在之後的活動當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並且是學生參與事件組織的一個切口，也使得他們在之後擔任起保衛治安的工作，甚而進行武力反抗，卻也為他們年輕的生命埋下悲哀的種籽。此為學生涉入此事件之始。

---

5 行政院二二八事件研究小組，《二二八事件研究報告》，台北：時報文化，1994.3。



事件發生當晚，透過廣播及部分人的口耳相傳，事情已在台北傳散開來，而許多學生也對此一事件表示憤慨，開始聚集討論如何應對此事件，台大的學生甚至演奏起日本軍歌。而一些積極的學生甚至準備動員群己的力量，進行遊行示威的活動。

此外，學生除了準備動員外，更擬具詳細的組織，並成立「學生軍」及「治安維持隊」等各種組織，準備投入這場反抗陳儀腐敗政府的活動中。在北部地區方面，除了台北之外，桃園、新竹等地的青年、學生也都群起集合、組織，或是直接北上參加活動。而在中部地區，則以台中為主要學校的學生或青年，自動的結合，並且亦組織「治安維持隊」，除了在校學生之外，中部地區的另一重點為以日治時期曾任軍人者，擔任指揮或負責的工作，此外，台共的勢力在中部則較為彰顯，以謝雪紅為主要人物，也與台灣其他志士、青年學生組織了名噪一時的「二七部隊」，抵抗國府軍隊頗為長的一段時間。在台南地區，則以台南工學院（今成功大學）為首，包含其他中學的學生及一般青年，在廣播中聽到台北的消息，亦準備展開行動。學生的組織迅速與熱情，年輕的衝勁與熱血沸騰，對於捍衛自己的土地展開了前所未有的保護戰。

南部地區，上有嘉義地區、高雄及其以南地區，同樣也都聚集了這些青年學子們共商國家前程，積極想改革的心情使得他們勇於站出來。嘉義等中學、職業學校、高雄地區的中等以上學校，以高雄中學為主的學生等，其他各地學校學生與社會青年，並不因為南北兩地的阻隔而影響了他們求取民主進步的決心。當時台北主要學校的學生，多數皆有參加事件活動，也可見出當時事件發生之初，台北地區學生的積極結合與反抗意識。

此外，學生們亦籌組了一個名為「台灣省自治青年同盟」的組織。該組織乃是一個以台北地區的學生為主，也包含一般青年，目的為結合青年學生



的力量而成立的一個具共同意識的團體。這個團體的共同意識，主要並非推翻政府，而是希望採取團結的力量迫使政府改革，以追求更高的自治與民主。當然不可否認，在這其中的某些人或許另抱想法，希望以更激進的方式獲得改革，並主張以武力來解決問題。其組織的綱領如下：

「三月五日上午十時，『台灣省自治青年同盟』假中山堂，舉行成立大會。由蔣時欽宣讀該同盟綱領：一、建設高度自治，完成新中國的模範省。二、迅速實施省長及縣市長民選，確立建國的基礎。三、發揮台胞優秀守法精神，為促進民主政治的先鋒。四、把握國內及世界新文化，貢獻民主與人類。五、擴大生產振興實業，安定經濟富裕民生。六、刷新民心，宣揚正氣，策進社會之向上。」<sup>6</sup>

在爆發緝煙事件後，長官公署的處理態度仍維持一貫的傲慢與不近人情，維持著無理的腐敗官僚作風。而在底下的查緝員荒謬粗暴的態度引發衝突，並傷及民眾性命之後，有關單位又不肯出面負責，也不願與民眾協調處理。年餘來已受到多方壓迫的台灣人，實在難以接受新政府的處理態度，這與風氣剛正的日本統治著實差得太多，在人心浮動之際，口耳相傳的憤慨隨之傳播，亦發激起人們心中的反抗意識。身為知識份子的青年學生，則更難掩心中那股澎湃激昂的志氣，同儕間培養的共識也使得他們積極參與討論，甚至起身進行活動，也引發了一連串全島各地的學生反抗運動。

## （二）對於學生活動的鎮壓與清算

在國府出兵鎮壓台灣之後，於3月9日宣佈全台戒嚴，並將全台共分為北部、中部、南部與東部四個綏靖區，成立各個綏靖司令部，負責各地區綏靖

---

6 林木順，《台灣二月革命》，頁28、29。



與之後的清鄉運動。

據當時美國駐台副領事喬治柯爾的記載：

「在陳儀黑名單上，列於處理委員會之後的是青年組織人員一忠義服務隊，這些都是教員和學生，他們曾於三月一日當大陸人背棄職守後，自動接管警察任務。政府根據服務隊的登記名單，展開了一項有系統的查詢，如有沒法立刻找到某一個學生，則他的一個家屬或同學得被押為人質或被用以替死。命令規定所有武器必須於限期內繳出，然而卻又同時嚴令任何人不得攜帶武器在街上行走。那麼，在這種矛盾的命令之下，一個老老實實的年輕人如何服從呢？如果挨戶搜查找到了武器，全家都會遭殃，而擔當責任的年輕人必然被射殺。但是，假如他被發現拿著服務隊！有學生名單的搜捕者到家裡找不到所要的人，那麼他的一個家人，可能是父親、祖父或是兄弟就要被捉走，家家都被嚇得不敢找尋失蹤的家人，有些人則倉皇的不知道去那裡尋找屍體。」<sup>7</sup>

官方的強制搜捕，以其家人親友作為要脅的對象，並竭其所能地捕捉嫌疑人犯，當然亦包括許多莫名冤枉者，這一連串的行動令民眾驚惶不已。

在這裡必須要提到一個問題，即是關於語言的部分。雖然事件發生時，已距陳儀政府接收一年有餘，在這期間也在學校與地方強力實施北京話教學，尤其學校教員都必須接受「國語」訓練，學生平日在校也都須學習「國語」並用以上課，每所學校中的外省籍教師也不在少數；但是，以一年左右的時間，台灣人的「國語」能力到底能進步到什麼程度？是否可以聽、說自如？得以順暢地表達自己心中的意思，而不造成不清與誤解？在事件中，有

---

7 本文摘自喬治·柯爾 (George Kerr)，《被出賣的台灣》。



很多被屠殺的狀況，或是造成誤會及判決的情形，也可能是因為語言的溝通不良而造成。當然有更多時候，士兵根本不分青紅皂白便開槍殺人，或是法官根本不採信被告的證詞就予以判決，但是語言的溝通不良，的確也是兩方存在的溝歧。

至於到底在事件當中有多少學生犧牲，則至今仍無法確切統計出來，但經由幾則回憶，則依然可推測當時情況的慘烈。喬治·柯爾（George Kerr）回憶道：

「據報導稱，在三月九日晚上，有五十名學生在松山被殺，三十名被殺於北投。三月十三日，我收到可靠的報告，說是過去五天之中，有七百名以上的學生在台北被捕。」<sup>8</sup>

而延平學院的校長朱昭陽則提到：

「事件發生後，很多警察躲起來，不敢來上班，有八、九十個延平學院的學生自願出來保護派出所，維持社會秩序，及二十一師登陸，展開血腥屠殺的時候，有些學生被殺，有些學生散掉了，沒有人敢再提起是延平學院的學生，說延平學院學生就會被捉去槍斃。此後，學生也沒有人敢再回來，外傳延平的學生犧牲不少，到底是多少，實在無法確知。」<sup>9</sup>

至於逮捕與判處的方式，依據當時普遍的狀況，初步歸類後可分為下列數種類型。<sup>10</sup>

---

8 本文摘自喬治·柯爾（George Kerr），《被出賣的台灣》。

9 本文摘自，台北：前衛，《朱昭陽回憶錄》。

10 當時被逮捕以及判處之人的身份大致為四種，分別為當局認定的共黨分子、各地處理委員會成員、當局認為與叛亂分子相關的人士，包括地方富商、士紳或台籍校長、以及學生軍領袖及成員。



逮捕方式可分兩大類：

### （一）直接抓人

#### 1. 採取欺騙方式

例：某某長官（或某某人）請你去何地或作何事，強行帶人。

#### 2. 以在門前作記號方式，敲門甚至破門入內抓人。

### （二）間接抓人

抓不到本人，則以其他家人代替（多為男丁），亦有抓錯人者，因同名同姓者。逮捕時間以深夜居多，白天亦有，基本上不分任何時間。

至於逮捕地點則通常為受害人家中（自宅）或者是其工作地點。

由此抓人的方式，可見官方當時必有詳細的被捕者名單：包括他們的姓名、居住地點、職業（工作地點）等等，只可惜今日仍無法找到史料證明。當時對被捕人犯採取酷刑，並用刑求方式逼迫，即使被害人不認罪，仍強行押印。（當時軍法處之「判決文」表式中，包括主文、事實、理由等三欄已先印好，只留下姓名、年齡、職業、住處…等各人不同部分予以空白）處理案件的地點，則為各地監獄、警察局、少部分在官方辦公室。至於那些定為死刑之人，其處決之場所則包括有槍殺執行場、路邊或者是河域四周。行刑方式，包括直接槍殺、以鐵絲綑綁手腳後再槍殺或以槍尾刀刺斃。另外還有將多人以鐵絲貫穿手腳、甚至鼻子，結成一排，人數由數人至十多人不等，再一同處決。有些若在河邊槍殺後，則在其身上綁上大石頭後推入河中。甚至在槍殺完畢後，還經常再以刺刀刺受害者以確定是否死亡。其手法之殘忍與對於人命之草菅與輕賤，實在令人髮指。

3月19日上午九時，教育處特地召集台北中等以上學校校長，為因應此次事件，對於學校訓育問題在台北召開會議討論，指出白崇禧表示「國防軍



開來台灣，係為調防性質，因台灣為海疆重鎮，必須增強國防」，又表示台胞受日人荼毒甚深，且受日人奴化教育因此對於祖國有所排斥，並缺乏民族意識與國家觀念，更認為「應以教育的有效方法，徹底變化〔台灣〕青年不良的氣質，並打破迷信的日本的心理」，並說「今後本省教育第一看，要改造台胞頭腦思想，並建立他們正確之人生觀，社會觀，宇宙觀，因而於學校訓導設施上，應予確定整個方針並統一步驟與方法」。也有與會校長表示「復課後教員對二二八事件的態度是避而不談、過分責備與完全諉與奸黨所為，故應請教育處發表書面統一解釋」、「台胞救護內地人士者，多半為情感作用，並非正義感之激發，應請示設法培養」，甚至有部分與會者也對本省籍教師的忠誠度也有所質疑，表示可能不適合擔任公民或訓導等工作。<sup>11</sup>隨後，對於學校與學生的一連串清算行動於焉展開。

在二二八事件後，由於少數學校參與人數者眾，因此竟有被迫合併或解散的情形，如省立高雄第一中學全校師生被予以解散，要求聽候查明處分；原一中教職員參加暴動者應徹底清查整理並報處核辦，學生則於一星期內由家長或保證人率領到校訓導處辦理特別保證手續，逾期以退學論。教育處並派省立高雄第二中學校長林一鶴於3月31日前去管理，在第一中學校產清理後，將高雄第一、第二中學在第一中學原址予以合併，仍稱省立高雄第一中學。另外如台北延平學院，因太多學生皆參與二二八事件，竟然慘遭勒令關閉的命運。

因誠於在二二八事件教員及學生的反抗過烈，國防部長白崇禧來台時，於3月28日在台北賓館發表善後處理方針演說，以圖重整學校的教育。其關

---

11 <台北市各省立中等以上學校訓育問題談話會紀要>，1947.3.19。國史館，《二二八事件檔案彙編》(七)，2002。



於學生部分做出以下的指示：1. 學生一律即行復課。2. 學生復課後除共產份子需積極取締外其他不再逮捕如有不軌行為可由校方按違反校規處罰。

而教育處對於事件後學校的整肅則一再明文規定，並重複強調事件是由野心份子及共黨等挑起，利用學生與民眾，並對參與事件的學生表示痛心，並同時表示為鑑往策來、懲前毖後，對於中等以上學校教育應重新改革。

從上述敘述中可以看出，對於二二八事件，國府認定為是由共黨從中作祟，以及「少數野心份子」與「暴徒」帶頭而引起，因而造成學生因年幼而被煽動。國府逃避面對己身苛虐而形成民眾反抗的事實，拒絕反省，更有欺瞞廣大社會之嫌。

至於對於學生的處置，官方表面上是以寬大為懷的態度包容參與事件的學生，甚至在發至學校的公文中表示力求減低退學的人數。但實際上，除了少數被予退學的學生外，其餘人或許免除開除的命運，但是卻仍有大小不一的處份，並沒有被輕易放過。雖然比較開除者已是寬大處置，但學生們心中所受到的傷害、產生的陰影，恐怕不是可以輕易抹滅的。尤其在之後長達數十年的日子中，他們因為「有案在身」，在面對學校訓導或教師的歧異對待外，即便離開學校開始工作，還必須受到單位長官的特別「照顧」，無法獲得比常人順利的升遷，可能連出國都成為困難，而管區警察還三不五時到家中「關心」，亦必須面對社會給予的異樣眼光，造成久久難以消散的陰影。

## 二二八事件的學生運動所展現的意義

在事件發生之後，由台北開始一連串的學生集結現象，無論彼此間認識與否，是否同校，學生間共同對於現實社會的不滿，隨著事件的逐漸擴大也產生了變化。從一開始只是表示抗議的遊行示威，逐漸轉變成抗爭的模式，



個人將此種行爲，歸爲學生間的「共振」現象。同儕間的情感，尤以學生而言，是較親密且緊靠的，每日同窗求學同學亦是，但對於不相認識的他校學生來說，由於共同具備「學生」的身分，因此在共同面臨一個大至影響整體社會的問題時，自許爲「知識分子」的學生，似乎也理當挺身而出，參與其中。而再以時代背景言，由於當時學校數並不多，各校班級數也極少，就以當時人數最多的學校也不過數百人，整體言中等以上學校的學生，無論在各地區或全國，都是極少數人口，因此就以學生＝知識分子＝社會一分子等這般的角色，他們認爲自己應當扮演「負起保衛改革社會」的責任，所以在事件中學生參與最多的是維持治安的工作，在日治時代的教育下，也迫使他們不得不有這樣的觀念。比如是琴上的弦，原本彼此間是獨立而不受影響的，但當撫撥其中任一條弦時，則其他的弦也會隨之發出共鳴而振動，而緝煙事件的那條弦，一但被早已積壓民怨已深的長官公署撥弄起來，也就演奏出一場可歌且泣而動人肺腑的樂章了。因此，從這個角度而言，學生在二二八事件當中，首先能夠代表的是一種台灣當時青年知識份子對於社會腐敗現象的不平之鳴，是一種勇於承擔其社會中堅改革份子責任的一種外顯。

從表現出的行爲而言，事件中的學生運動最主要的作爲，乃是在理性的框架之下進行抗爭活動，希望政府能夠對其腐敗作爲有所檢討。另一方面，在事件進行當中，這些學生亦試圖在可見的社會混亂情況之下，維持秩序與安定，甚至避免省籍衝突擴大。無論如何，這些活動的內容，與國府當局所宣稱的「暴動」均相去甚遠，其說法甚至全然扭曲學生在事件中所扮演的角色。

我們知道，自緝煙事件導致民眾群起抗議之後，由台北開始，人們的憤怒情緒延燒了全島。年輕的學子們聚集討論，悲痛的痛陳時政，表達各人心中的社會關懷。但同時，這些學生也開始肩負起社會安定維護的工作。台北



方面在3月2日正式成立「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3日會中正式編制由學生負責的「忠義服務隊」。而各地也隨之開始於各地區的「處理委員會」之下，成立由學生組成的「治安維持隊」，維持地方的治安。有些縣市則以類似名稱代替，如「義勇隊」等，其職責相同，均為維持地方治安。他們主要的工作為利用隊伍組織，分組在地方上進行巡邏，保衛地方上安全。他們的防身工具為一般的竹棍、木棒或竹劍木劍等日治時期留下的武器，部分為地方上派出所或軍方單位的武器。在緝煙事件擴大至全台後，許多公家機關如警局都鬧空城計，主為那些外省籍人士害怕遭到台籍流氓的毆打或報復，紛紛棄離職守另避風頭，造成各地維持治安的基本受到破壞，因此處理委員會則派學生暫代職責，在紛亂之際保衛地方安全。然而這樣的好意，事後卻被指稱為「佔領」警局等機構的罪名，以及以「搶奪」、「劫收」武器等罪名與以判刑，造成所謂「暴動」的最佳藉口。

誠然，由於學生在維持治安或事件逐漸演變為武裝鎮壓的過程當中，因為種種原因而獲取武裝，使得當局更有充分藉口將其視為「武裝暴動」。但由於其出發點並非任何計畫性的「革命」或「武裝起義」，而只是社會治安層面的維護或是到國民黨軍隊登陸後的被動反抗，因此其最後流血失敗、事件過後被加以清算、甚或被用來作為宣傳與安撫人心的工具，則似乎是可預期的悲劇。從這樣的角度而言，二二八事件中的學生運動，代表的是一場台灣青年知識份子之風骨與政府強大武力與公權力的爭鬥。可惜的是，這場爭鬥的結果是以青年知識份子的重大挫敗告終。



## 結語

以學生的反抗運動而言，反抗過程中身體的表現，在本質看來是一種位於空間的「廣延性存在者」。人因為有了身體，自此在空間中佔有了位置，因此人在世界之中方有展現的姿態。於是身體也成為意識主體的「空間經驗」，這些經驗則包含了身體的活動及各類探索(與社會人、事、物之互動)，且由知覺意識主導。<sup>12</sup>而學生們的意識形成支配其身體的主宰，促使其對政府進行抗爭的行為，表現在社會的既定關係下，個人所扮演的「角色」，在特殊脈絡下則與他者產生關聯，形成具共同意識的團體，進而產生富同質性並一致的活動。因此，青年人的熱情與正義感，同儕間所凝聚出對社會的期待，是為其抗爭及要求改革的重大力量。

在二二八事件中的學生反抗運動，基本上並不具備完整的組織系統，多半依附在各縣市的處理委員會之下，組成如「義勇隊」、「治安維持隊」等組織，主要目的在於協助治安的維持。部分學生則加入武裝隊伍，如中部的「二七部隊」便吸收了許多台中附近的學生。

但整體言，學生投入事件工作，只是欲維護地區治安，保障人民安全。為此到各地警局或軍方倉庫拿取武器，目的也在於此。但因槍彈武器的嚴重不足，更多學生手上所拿的只是木棍與刀子，對於抵禦國府軍隊的槍彈實為「不可能的任務」，連自衛都成問題。

在國府鎮壓過程中，參與者中的部分學生因軍隊不分青紅皂白的射殺而喪生，部分學生因嫌疑重大而被捕捉，少數學生則逃亡至鄉間或山中。雖然

---

12 見 Michael C. Howard, 《Contemporary Cultural Anthropology》, 李茂興、藍美華譯, 《文化人類學》, 台北: 弘智文化, 1997。頁 241-243。



國府在事後發表聲明，表示只要出面自新便不追究，同時與家長及保證人共具悔過書即可回校，但是仍有少數具「嫌疑重大」或「顛覆叛亂」的學生，因之被毀前程。

事件後國府進行一連串新政策，在校園中則採取更強硬的管理，訓導等制度也由此開始，各式管理更趨軍事化，社團活動亦被嚴加看管甚至禁止。國府在校園中所展現的「能力權威」(competent authority)，充分展現在事件後校園內各項政策的執行，並顯示強烈的驅動力量。就以其策略言，學校教育顯然有其十分重要的目的及地位，透過這樣的集體教育，形成一種行為及思考上的制約，對於人民的控制達到深層的目的，並且具改造思想與僵化觀念的功效。

二二八事件所造成的深遠影響，在五〇年代白色恐怖中仍可找尋，許多在事件時未被捕捉的人士，卻反而犧牲在數年後的各類匪諜案中，而真相只有善於報復及偽造罪名的中國國民黨政府明白。但是台灣人的堅強與韌性，仍堅持出更多的反抗運動，在二蔣強人政治與長時間的戒嚴下，仍為爭取民主與自由奮鬥著，並不因此屈服，這便是最令人感動的台灣精神！



～參考書目～

一、官方檔案

- 1.國防部檔案：軍法局檔案、軍情局檔案、史政編譯局檔案。
- 2.國安局檔案。
- 3.高等法院、各地方法院檔案。
- 4.省文獻會檔案。
- 5.各大、中學校檔案。

二、專書論著

- ◎中研院近史所「口述歷史」編輯委員會，《口述歷史第四期：二二八事件專號》，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3。
- ◎中國時報編印，《台灣：戰後五十年》，台北：中國時報，1995。
- ◎王峙萍、林秋敏，《二二八事件檔案彙編》（五）（六），台北：國史館，2002。
- ◎王育德，《台灣－苦悶的歷史》，台北：自立晚報，1993。
- ◎王景弘，《第三隻眼睛看二二八》，台北：玉山社，2002。
- ◎王建生、陳婉真、陳湧泉著，《1947台灣二二八革命》，台北：前衛，1990。
- ◎行政院二二八事件研究小組，《二二八事件研究報告》，台北：時報文化，1994.3。
- ◎台灣新民報編，《臺灣人士鑑》，台北：台灣新民報，1934。
- ◎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民政處編，《臺灣省五十一年來統計提要》，台北：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1947。
- ◎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民政處編，《臺灣一年來之民政》，台北：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宣傳委員會，1946。
- ◎台灣省警備總司令部，《臺灣省「二二八」事變記事》，台北：長官公署統計室，1947。
- ◎台灣省文獻會編，《重修台灣省通志卷六》（文教志教育行政篇），南投：台灣省文獻會，1994。



- ◎台灣省文獻會，《重修台灣省通志卷六》（文教志社會教育篇），南投：台灣省文獻會，1993。
- ◎台灣省文獻會編，《二二八事件文獻輯錄》，南投：台灣省文獻會，1995。
- ◎台灣省文獻會編，《二二八事件文獻續錄》，南投：台灣省文獻會，1995。
- ◎台灣省文獻會編，《二二八事件文獻補錄》，南投：台灣省文獻會，1995。
- ◎台灣省政府教育廳編印，《教育法令輯要》，1951。
- ◎台灣省政府主計處編，《台灣省統計提要 1946-1967》，南投：台灣省政府主計處，1971。
- ◎台灣省政府新聞處編，《台灣光復三十年：文化建設篇》，南投：台灣省新聞處，1975。
- ◎台灣省政府新聞處編，《文化建設》，南投：台灣省政府新聞處，1981。
- ◎台灣省教育廳編，《十年來的台灣教育》，南投：台灣省教育廳，1955。
- ◎史明，《台灣人四百年史》，台北：蓬島文化，1980。
- ◎世界知識出版社，《中美關係資料彙編》第一輯，台北：世界知識出版社，1957。
- ◎丘念台，《嶺海微飆》，台北：中華日報社，1996。
- ◎古瑞雲，《台中的風雷》，台北：人間，1990。
- ◎李筱峰，《二二八消失的台灣菁英》，台北：自立晚報，1990。
- ◎李筱峰，《台灣民主運動四十年》，台北：自立晚報，1987。
- ◎李筱峰，《解讀二二八》，台北：玉山社，1998。
- ◎茅家琦編，《台灣三十年 1949～1979》，中國：河南人民出版社，1988。
- ◎彭懷恩，《認識台灣--台灣政治變遷五十年》，台北：風雲論壇，1997。
- ◎彭孟緝，《臺灣省「二二八」事件回憶錄》，打字稿，未出版，影印本現藏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檔案館，1953。
- ◎黃玉齋，《台灣年鑑4》，台北：海峽學術，2001。
- ◎黃嘉樹，《國民黨在台灣 1945-1988》，台北：大秦，1994。
- ◎張炎憲、李筱峰編，《二二八事件回憶集》，台北：稻鄉，1993。
- ◎張炎憲、胡慧玲、黎澄貴，《台北都會二二八》，台北：吳三連基金會，1996。



- ◎藍博洲，《沉屍.流亡.二二八》，台北：時報文化，1992。
- ◎薛化元，《台灣歷史年表：終戰篇 I（1945-1965）》，台北：業強，1993。
- ◎薛化元，《自由中國與民主憲政》，台北：稻香，1996。
- ◎喬治.柯爾（George Kerr），《被出賣的台灣》，台北：前衛，1991。
- ◎國史館，《國史館藏二二八檔案史料》上中下三冊，台北：國史館，1997。
- ◎國史館，《二二八事件檔案彙編》一至四冊，台北：國史館，2002。

### 三、期刊論文

- ◎黃敏原，《論教育與規訓 - 以日治時期台灣的皇民化現象為例》，台大社會研究所碩士論文，1998。
- ◎郭正亮，《國民黨政權在台灣的轉化（1945-88）》，台大社會研究所碩士論文，1988。
- ◎楊聰榮，《文化建構與國民認同 - 戰後台灣的中國化》，清大社會人類所碩士論文，1992。
- ◎李筱峰、洪聰益，〈蔣政權「反共抗俄」的政治迷思史料舉隅〉，《台灣史料研究》12，1998。
- ◎李筱峰、林芳微，〈回憶與自傳中的二二八史料〉，《台灣史料研究》11，1998。
- ◎張炎憲，〈二二八 — 台灣史詮釋的原點〉，《台灣史料研究》3，1994。
- ◎薛人仰，〈台灣教育之重建〉（1945.8.25），陳鳴鐘、陳興唐主編，《臺灣光復和光復後五年省情》（上），中國：南京出版社，1989.8。
- ◎鍾才，〈戰後臺灣留日學生的獨立建國運動史〉，《臺灣史料研究》，1994.10。
- ◎鍾肇政，〈台灣青年淚和血 -- 黎明前的小插曲〉，台北《自由談》3：4，1952.4。

### 四、外文資料

- ◎奧田真丈監修，《教科教育百年史》，東京：建帛社，1985。
- ◎臺灣教育會編，《臺灣教育沿革誌》，臺灣教育會，1939。
- ◎臺灣總督府編，《台灣學事法規》，臺灣總督府，1943。
- ◎台灣教育會編，《臺灣學事年鑑》，臺灣教育研究會，1940。



- ◎ E.Patricia Tsurumi , Japanese Colonial Education in Taiwan , 1895-1945 。林正芳  
譯，《日治時期台灣教育史》，宜蘭：仰山文教基金會，1999。
- ◎ Kerr , George H 著，陳榮成翻譯，《被出賣的臺灣》，台北：前衛，1991.3。
- ◎ Pareto , The Rise and Fall of Elites.

